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旌勇里国史讲座

(第三辑)

JINGYONGLI
GUOSHI JIANGZUO

李正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旌勇里国史讲座

JING YONG LI
GUO SHI JIANG ZUO

(第三辑)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旌勇里国史讲座. 第3辑/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54-0194-2

I. ①旌… II. ①当…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0227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杨利平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印张 2 插页 2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总 序

当代中国研究所是国家设立的专事编纂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机构，也是一个成立时间不长的新单位。为了开阔所内研究人员的学术视野，也为了加强所内外的学术交流，更为了活跃国史学界的学术空气和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我们于2001年初开始举办月度国史讲座。讲座人主要邀请国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名学者，也邀请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者。讲座内容既有对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究，也有对国史研究中某些专题的解析；既有国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有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既有对学术观点的切磋，也有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讲座听众以所内人员为主，同时也请所外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前来。为了使更多关心和有志于国史研究而又不能前来听讲的人能够分享这些讲座的知识，我们决定随着讲座的不断延续，依次选择部分讲稿汇编成册，陆续出版。因为当代中国研究所位于什刹海附近的旌勇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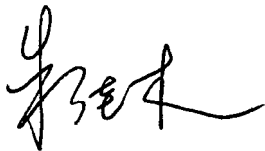
号，故将书名定为《旌勇里国史讲座》。

严格意义上的国史研究，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的，也是从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但党史是专史，而国史是通史，是断代史。因此，凡是对通史、断代史研究适用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国史研究也同样适用。然而，以往的断代史都是已经结束的、由极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而国史却是正在发展着的、由绝大多数人当家做主的历史。因此，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克罗齐语）的话，那么，国史就更加是“当代史”，更加反映当代人们对当代史的认识，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如果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清·龚自珍语）的话，那么，一切被推翻被赶走的敌对势力，为了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更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共和国的历史。因此，我们并不隐瞒对讲座人的选择标准，那就是：大陆学者要站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尊严的立场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观；而国外和境外学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欢迎讲座人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并提倡不同意见的争鸣。正因为如此，收入讲座选集中的观点，有可能是彼此矛盾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在中国古代，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情况。这首先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那时，所谓当代、前代均以帝王姓氏为标志来划分。在当朝帝王的统治下，史家写史必然颇多忌讳，难以秉

笔直书。另外，那时的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诸多不便。而现在，这些不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仅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建国以来的文献档案被解密、编辑和出版的也越来越多，从而使研究国史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充分。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历史只是少数统治者关心的事，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当代的历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希望通过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党执政的规律，通过正确反映新中国的光辉业绩，教育和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因此，作为专门从事国史编纂和研究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不仅要努力完成好党和国家交付给自己的任务，还有责任积极扶持和振兴国史学这门年轻的史学分支学科。而举办月度国史讲座，便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这个讲座将会不断办下去，讲座选集也将不断出下去。我们希望热心于国史研究的读者看过此书后，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使国史讲座办得更好，使讲座选集更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2004年8月



目 录

1. 从“城乡互助”到“统筹城乡发展”
——中国共产党处理城乡关系的历史经验
武 力 (1)
2. 社会结构阶层化、利益关系市场化
——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李路路 (19)
3. 乡土中国经济基础的“三农”与上层建
筑的“三治”
温铁军 (47)
4. 当代中华体制
潘 维 (69)
5. 关于实施藏水北调解决西部民族地区水
资源短缺的问题
李国安 (81)
6.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
系及监测结果
李 纲 (93)
7.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
齐德学 (119)
8. 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及安全环境
徐 焰 (141)
9. 一段似“左”非“左”历史的辨正——国
民党起义部队改造史研究感悟
高戈里 (153)

旌勇里国史讲座

JINGYONGLI GUOSHILJIANGLUO



10. 认识台湾历史的特点与对台工作的复杂性
 张海鹏 (179)
11. 全球化的宗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卓新平 (185)
12. “东突”分裂主义的由来与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
 厉 声 (203)
13. 中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态势
 程恩富 (225)
14. 关于国史、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若干问题
 程中原 (247)
15. 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 (摘要)
 [美] 沈大伟 (263)
16.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郑大华 (267)
17. 孔子和儒家思想在 20 世纪中国
 林甘泉 (287)
18. 走近晚明
 商 传 (307)
19. 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
 陈之骅 (331)
20. 苏联解体的原因 (摘要)
 [俄] 尼·伊·雷日科夫 (357)
21. 苏联解体的原因 (摘要)
 [俄] 米·伊·科京 (371)

22. 古巴革命胜利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
[古巴] 奥斯瓦尔多·马尔提内斯 (387)
23. 中东变局的起因及影响
王灵桂 (391)
24.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性质、历史沿革
及工作情况
[韩国] 柳永烈 (409)

旌勇里国史讲座

JINGYONGLI GUOSHI JIANGZUO



从“城乡互助”到 “统筹城乡发展” ——中国共产党 处理城乡关系的 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武 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兼中国现代经济史分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重点为政府经济职能和产业结构演变。曾经主持和参加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和重大课题。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合著）。

毛泽东说过：“中国虽然有 960 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①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和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处理好城乡经济关系，始终关系到工业化能否顺利实现和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否充分体现的两个根本问题。因此，系统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城乡关系认识的变化以及原因和后果，对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都有所裨益。

一、“城乡互助”的提出和实施（1949—1952）

旧中国留下了农村经济凋敝、城市商业畸形繁荣的烂摊子和城乡对立的关系：经济上，是乡村经济凋敝、城市经济畸形繁荣；城乡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政治上，城乡严重对立，城市压迫和剥削乡村；刘少奇说过：中国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共产党所以能够成功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因为城乡关系为革命提供了条件。

1949 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不仅东北和华北的大中城市解放，而且全国解放也已经为期不远，“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即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解放后的城乡关系，就成为讨论向全国进军和建国问题的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36 页。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从一九二七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①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各地立即进行传达和讨论，其中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从各地报告看，当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疑问，例如“认为农村多、农民多，城市少、工人少，农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贡献大，城市解放晚，工人对长期革命战争的贡献又不如农民，为什么将工作重心移到城市，并由城市来领导乡村？”^② 二中全会后的学习和讨论对纠正党内城乡关系上存在的“糊涂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城乡互助”的思想和政策。东北解放区是最早实现全境解放并且工业城市较多的解放区。1948年8月，东北局在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城市全部回到人民手中的背景下，召开了“东北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在会议结论中提出：“过去我们说，城市要为乡村服务。现在我们要增加一条：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就是说，城市和乡村要互助合作。这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的区别。那时是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农民害怕城市，仇恨城市。……但是，一般地说城乡互助合作还不够。还应该指出，城市对乡村起领导作用，城市领导乡村。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88—589页。

② 《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69页。

城市在城乡互助合作中领导乡村，其实质就是：工业与农业并重，工业领导农业；工农联盟，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因此，它应该而且有资格领导乡村。”^①

“城乡互助”思想包含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政策内。1949年9月，它被写入《共同纲领》，在建国前后的城市接管、恢复发展生产、建立新经济制度和新型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都起着指导作用。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城乡关系阐述最清楚的，当属周恩来在1949年12月关于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它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周恩来说：“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的国民经济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②

二、乡村支持城市的“大仁政”阶段（1953—1978）

20世纪50年代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壁垒的形成，很大程度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上起因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本来中国就是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不仅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而且城市的就业压力也始终很大。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党和政府曾动员一部分刚从农村出来不久的失业人员返回农村参加土地改革,重新成为农民。

1952年7月政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草案,形成一致看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应靠发展多种经营,就地吸收转化,防止其盲目流入城市,增加城市的负担。会议制定并于同年7月25日经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农村中因已耕的土地不足,农村劳动力过去就有剩余。土地改革后,人人有地种、有饭吃了,但已耕土地不足的情况基本并未改变,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加以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与目前条件下可能的农具改良,如不在农业、副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等方面积极设法,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将更加多,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是在无组织无计划地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着,这也增加了城市中的失业半失业现象。”^①《决定》在分析了城市就业问题和农村劳动力富余情况后,提出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应该在农村就地发展各种产业来安置。

众所周知,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第五条就将自由迁徙作为人民的11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52)》第3册(电子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自由权利之一。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1949 年建国以后的户籍制度和管理工作基本上遵循了上述理念和法律。

但是，1953 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许多农村青年为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条件所吸引，纷纷涌入城市和工矿区，这不仅加剧了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增加了农副产品供给的紧张，因此，从 1953 年到 1957 年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一再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应该有计划地进行。直至 1958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令的形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城乡分隔、严禁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的最终确立。

自此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就业和食品供应紧张，特别是 1960 年以后，城乡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基本上被严密的户籍制度和粮票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严厉隔绝；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由于实行单一的集体所有制而受到严厉限制，除了特殊情况和计划招工外，农民被束缚在既有的那块土地和社区内。1964 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即：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64 年李先念概括地说过：“人总是要吃饭的，问题是在农村吃还是在城市吃。我看在粮食和副食品并不宽裕的条件下，该在农村吃饭的，还是在农村吃好，因为在农村吃比在城市吃要省得多。城市并不缺乏劳动力，各行各业也并不缺人，因此要尽量不增加职工，更不要轻易从农村招收



职工。”^①“文革”期间，为了安置城市里不能就业的青年，甚至动员和强制城市人口向农村的逆向流动，即1600多万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些都说明：这个阶段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常缓慢，除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因素外，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市就业困难则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性因素。

在1953—1978年间，城乡经济关系的核心实际上是工农业关系。

在工农业关系方面，由于农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吃饭和为轻工业提供原料以及出口等重大问题，始终受到中共中央和全党的高度关注，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30年里，由于吃饭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党是高度关注和希望大力发展农业的。1949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就不用说了。从1953年起我国转入大规模工业建设，从此工业与农业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由于实行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投资大、周期长和吸纳劳动力有限，农业提供的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需要的矛盾从1953年开始就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和工业化的“大仁政”考虑，打算依靠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加速农业发展，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问题。这就是实行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虽然在当时是按照市价来决定统购价格的，但由于限制了农民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农业合作化虽然在最初的互助组和示范初级社期间显示出优越性（其中还有国家大力扶持的因

^① 《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286页。